

侯仰军◎著

考古发现

与夏商起源研究

KAOGUFAXIAN YU
XIASHANGQIYUANYANJIU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第一辑

总顾问◎詹子庆

李学勤师传学者文库



侯仰军◎著

考古发现 与夏商起源研究

KAOGUFAXIAN
XIA SHANG QIYUAN YANJIU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发现与夏商起源研究/侯仰军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10

(李学勤师传学者文库)

ISBN 978-7-207-08457-6

I. 考... II. 侯... III. ①中国—古代史—研究—夏代 ②中国—古代史—研究—商代
IV. 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5176 号

责任编辑:孙国志 张 红

装帧设计:张 骏

考古发现与夏商起源研究

Kaogu Faxian Yu Xia Shang Qiyuan Yanjiu

侯仰军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市工大节能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插页 4
印 张 8.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8457-6/K·1033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出版说明

重视学术上的师承关系,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传统学术流派和学术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对我们今天的学术流派和学术思想研究也有重要意义。我们在成功运作《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的基础上,现将《李学勤师传学者文库》奉献给学术界和出版界。该《文库》主要收录李学勤先生弟子各自的代表性著作,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怎样在继承师学的同时,又做出了自己创造性的贡献。我们相信,《文库》对于进一步繁荣我国人文学术研究,促进学术交流和社会文化发展,将做出有益的探索。



总 序

即将付梓刊行的《李学勤师传学者文库》，是继《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问世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精心策划的又一件学术出版盛举。众所周知，中国学术自古就重视师生传承关系，而理清著名学者的传承系统，对了解一个时代的学术流派及其特征，全面深入地反映其时代的学术风貌都是十分必要的。

李学勤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他虽年逾古稀，但一直活跃在中国古史研究领域，出版了二十余部学术著作，发表论文 600 余篇，有的已有英、日、韩译本，并有多种专著和论文获奖，称他为著作等身、蜚声海内外的大学者，是当之无愧的。

1

李学勤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继承和弘扬了王国维先生倡导的古史“新证”派传统，注重将传世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及其铭文、战国文字、简牍帛书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的研究领域，均有重要建树。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他整理殷墟甲骨，用排谱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历史地理，并首次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他首创殷墟甲骨的非王卜辞说，继而又就历组卜辞等问题提出两系九组的新分期法。在青铜器及其铭文的分期、分区、分国别研究中，也取得较大成就。在系



统研究甲骨、金文的基础上,他对商周时期的礼制、职官、法律等方面作了缜密探索。50年代后期,他综合研究战国时期金文、陶文、古玺、货币文字及简帛,从而促使古文字学领域中新的分支——战国文字学研究形成。他从1975年起先后参加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等出土文物的整理注释;并利用这些新材料,对战国以至汉初的学术史、文化史进行探索。1996—2000年在国家科技部组织下,李学勤先生作为首席科学家之一,主持参与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的实施全过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报告·简本》)。目前,李先生仍奋力工作,领衔组织对新近从海外捐赠的《清华简》的保护、整理、考释和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研究的广泛期待。

李先生是中国先秦史学会受人尊敬的领导,也是我们大家的良师益友。我早在上大学阶段就拜读过先生的名作《战国题铭概述》和《殷代地理简论》,给我的印象很深,只是由于我当时知识储备不够,对这些作品不能完全消化,但确使我对古史探索增加了许多好奇心和学习兴趣。我第一次见到李先生已是1982年秋在西北大学召开的先秦史学术讨论会上。先生在会上提交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论文,引起与会者各位先生的极大反响。以后在多次先秦史学会召开的学术会上,我们经常有机会见面,常能听到先生的高见。先生谦和睿智,常常被大家拥戴为学术核心。前几年先生受金景芳教授的邀请常来吉林大学古籍所主持博士论文答辩,我亦有幸参加,先生对论文所提出的中肯、准确评价以及修改意见,不仅使论文作者受益匪浅,而且给与会者亦有益的启迪。每当先生来吉大参加答辩的机会,我又邀请先生来东北师大做学术报告,每场精彩报告都吸引众多青年学子争相聆听,引发了



大家对古史奥秘的不尽思考。

仅就我个人而言,亦得到先生多方面的指教。诸如前几年出版社约稿,邀李学勤先生和孟世凯先生负责主编一套《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系列丛书,由我分工承担《夏史与夏代文明》卷,在写作过程中,我产生了畏难情绪,此时,我得到李先生的鼓舞和支持,才使我坚定信心完成了这部不成熟的拙书,作为中国先秦史学会的集体成果而奉献给学术界。在我担任东北师大出版社总编辑时,李先生向我推荐了吴静安撰《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书稿,是稿终使清末扬州学派刘文淇《左传》学得以完璧。本书出版后得到学术界很好反响,并于2008年2月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这也是我们之间学术交往的一段姻缘。我衷心感谢李先生对我工作的支持。

我是学习李学勤论著的热心读者,先生的大多数重要论著我都拜读过,其学习心得这里难以一一言表。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我羞作妄加评论。在我们的心目中,先生对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研究,可以称之为当代国内思想最活跃、成果最丰硕的领军人物之一。其中最为突出的贡献表现为:因为先生喜逢当今学术繁荣盛世,考古发掘成果累累,新材料不断面世,先生能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凭借先生对古文献的谙熟和深厚基础,钻研和运用这些新材料,将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紧密结合起来,运用多学科交叉结合的研究方法,使古史、古书中许多疑点、难点,或前人误解的问题,经过先生的“新证”而得到涣然冰释的效果。先生以其犀利的眼光,时刻把握着时代学术的脉搏,引领着古史研究的风气之先。先生的学术旨趣不仅反映在他的每部论著中,同样也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传授给他的弟子们。先生在繁忙的学术活动中,不仅撰写了



大量的著作,而且培养了众多弟子。他们攻读李先生的博士学位,是非常幸运的。先生对学生严格要求,使其弟子活跃在本领域,成长为各有专长的学者,现将他们经过李先生悉心指导、凝结先生心血而撰写成的研究论著集辑出版,名曰《李学勤师传学者文库》,为“百舸争流”的学术繁荣局面又增添了新景象,我们怎能不为此而感到庆喜呢?

詹子庆

2009年9月10日



序

侯仰军同志的大作《考古发现与夏商起源研究》就要出版了，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仰军同志是山东人，原在齐鲁书社工作，2006年4月初我应菏泽历史文化与中华古代文明研究会之邀，前往菏泽地区考察那个地方的古代文化遗址，他作为该研究会的副会长，与研究会会长潘建荣同志几乎天天陪着我到各个垆堆转悠，令我十分感动。那时他才从山东调到北京工作不久，同时带职攻读山东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博士学位，由于对地方历史文化怀着浓厚的兴趣，就选择了这个题目做他的博士论文。现在，这篇博士论文已获得通过，且经过修改，即将付梓。承仰军同志信任，要我为他的论文作序，我也正好有几句和这个论题有关的话，想在这里提出来，向作者与诸位先生请教。

1

夏商时期属于现在考古学所称的“原史”时期。对于这个时期历史的研究，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将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则是研究取得进展的关键。这些道理，相信大家都明白。然而从目前研究的实际效果看，这种结合却做得不那么理想。不是说这方面的文章写得不多，书出得不够，而是研究的深度不够，问题真正得到解决的不多，为学术界一致认可的研究成果不多，许多结论经不起推敲。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认为，出



在对这种结合的简单、机械的理解上。一个最明显的表现,便是不少人喜欢在某个考古文化与某个王朝的文化或某个复杂社会的文化之间画上等号,如称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下七垣文化就是先商文化、岳石文化就是东夷文化,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称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这完全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且不说文献记载夏王朝的活动地域与其活动时间同二里头文化并不十分吻合,就是从一般考古学原理来说,将一种考古文化与一个王朝居民留下来的文化遗存说成是一回事,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当代西方著名考古学者布鲁斯·炊格尔(B·C·Trigger)就曾指出,考古学文化概念只适合于研究小规模、相对封闭且较为定居的史前文化,对于复杂社会,由于其社会和经济的差异会造成文化上的多元性,因而考古学文化在观察这样的社会时就成了不适当的衡量手段(布鲁斯·炊格尔《时间与传统》,三联书店,1991年,第126页),像夏王朝这样的政治实体,应当不仅已进入复杂社会,且已进入了国家社会,怎么可以和一个单纯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呢?我在很早以前就表示过,我们只能承认二里头文化所跨越的某一时间内,在它的某一地域,可能包括有夏后氏活动的遗迹,不赞成将二里头文化整个地归于夏文化。最近,李学勤先生也不止一次地谈到考古学文化与古代王朝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一些学者在这二者之间画上等号的做法是不合适的。他明确表示,像岳石文化分布的一些地区,文献明明提到夏人的部族在那里活动过,怎么可以把它排除在夏文化范围之外呢?就当前考古工作的实际进展看,一些地方发现的可以同文献所述夏王朝活动地域相互印证的考古文化遗迹,早已突破了二里头文化分布的范围。如河南濮阳帝丘古城下面叠压着的大片龙山时期的堆积和夯土层,通过同



《左传·僖公三十一年》的有关记载相互对照,已可证明这里是夏代早期的一处大型遗址,并很可能是夏后相甚至夏禹的都城。然而抱着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这个看法固定不变的学者却似乎对之不屑一顾,这种态度怎么能说是实事求是,又怎么可以推动夏文化探索的进一步发展呢?

侯仰军同志这篇论文的最大优点,我认为就在于比较好地做到了文献与考古材料的有机结合,他没有简单地在夏、商文化与某个考古文化之间画等号,而是通过对文献记载与夏商起源有关的历史事件、人物及有关居邑的仔细考察,再引以与一些具体的考古发掘的资料,包括古文字资料相互对勘,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如本书所安排的“考古发现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考古学所见大禹治水研究”、“亳都考辨”等章节,均体现了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其中提出的许多论点,也是信而有征的,相信读者在阅读本书后,会有不少的收获。

夏商起源问题属于我国古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部分,这个问题还有许多待解之谜,期望作者与各位同仁继续努力,为这项工程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沈长云

二零零九年夏日于石家庄河北师大寓所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



序

在我国传说及夏商历史上,大概没有一个区域像以今天的菏泽为中心的历史文化区那样有如此丰富的内涵。究其原因,应该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从历史地理来说,该区域虽然分布着不少湖泽,但这非但没有带来交通上的阻隔,湖河密布,岗丘聚集,反而带来了交通上的便利。按照东西横向的交通,该地恰处在华夏与东夷交汇区;而南北纵向上,其间也无任何地理障碍,交通极为便利。不同部族迁徙、流动,最终在此融合,因此,传说中的圣王多在此留下了出生、居住和葬地的记载。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则表现出文化交汇区所特有的文化(因素)多元性,以至于很难将其定位于某一或某些族群的遗存。

1

就古史传说而言,撇开三皇不谈,仅从帝尧算起,圣王在菏泽的足迹便已是不绝于书。例如,定陶是帝尧“游居于陶”(《古本竹书记年》)所在,而成阳(今成阳城遗址)附近有尧陵(《汉书·地理志》);帝舜则“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史记·五帝本纪》),历山地望争议颇多,但雷泽、河滨均在菏泽或其附近,则是共识;《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及兖、青、徐三州水路贡道,地名、水名多在菏泽;成汤都亳、景亳之会、鸣条之战、归泰卷陶(《古本竹



书纪年》及《殷本纪》等),灭夏前后商族的大事无不与菏泽有关,加之近人王国维先生所作《说自契至成汤八迁》之阐发,鲁西南菏泽一带为商先公先王之故居益为学界所信从。

考古学从上个世纪之初传入我国以后,便以“古史重建”为其宗旨,而尤重于上古王朝历史的构建,结合文献传说寻找先贤圣王的史迹成为上个世纪相当长时期的主流。有着丰富古史文献积淀的豫东及鲁西南地区,自然很早就成为考古学界关注的对象。关注的焦点,概而言之,集中在帝舜有虞氏和商代先公先王方面。殷墟发掘之后,学术界便发出了这样的呼声:“这种文化究竟是在哪里萌芽然后发育成长的?哪里是她的前身?这是研究中国上古时代人所急于要寻找出来的!”(李景昶:《豫东商丘永城调查及造律台黑孤堆曹桥三处小发掘》,《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1936年秋李景昶等人到商丘的调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此次调查发现若干处龙山文化遗址,并对其中的永城县造律台遗址进行了发掘,填补了龙山期文化地域分布上的空白。20世纪50—70年代,梁山青堍堆、曹县莘冢集等遗址的发掘,其初衷也是为了寻找先商文化。同时,临近的豫、皖两省的考古材料也有所积累。正是根据这些材料,李伯谦先生撰写了《论造律台类型》一文,认为造律台类型比考古学界所要寻找的先商文化时代要早,“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有虞氏文化”。这一时期,海岱地区大约与夏代和先商同时期的岳石文化被确认,冀南豫北地区也找到了所谓的先商文化(即下七垣文化)。鉴于岳石文化与公认的二里岗期早商文化之间在陶器组合上差异明显,岳石文化属于非商系统似乎得到多数学者的肯定,如果在菏泽发现岳石文化遗存,那么传统的商文



化东来说便会失去其考古学根基。在这一思路指导下所进行的菏泽安邱堽堆遗址的发掘,正如发掘者所预期的那样找到了岳石遗存,先商东来说一时被北来说所遮蔽。但正如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的那样,考古学文化、族、王朝是不同概念,至少从目前来看,我们还没有寻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整合这些概念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对于史前时代及原史时代,更是如此。

殷墟之于晚商,二里岗之于中商、早商,二里头之于夏,尽管争议不断,但它们是考古学“古史重建”的硕果,是无可置疑的。但显而易见的是,历史与考古这两套话语系统的契合是有条件的,起码的条件,于历史而言,有充分的文献史料,哪怕是传说史料;于考古而言,有与历史或传说史料相联系的、规格匹配的古代遗址。也就是说,并非每一个遗址、每一项发掘都具备这种契合的条件。考古遗址大多数都是经历数百年若干代人居住才能形成,因而考古记录更善于表达长时段甚至是跨时段的区域历史;而历史事件往往是瞬间或短时间内完成的,具备条件记录下这段历史的遗址少之又少。因此,“整合”的工作不是不能做,而是要慎重地去做。眼下从区域史的角度做些历史及传说文献的梳理工作很有必要,只是在与考古资料的“整合”上,不要说得太过绝对。如果将来区域考古的工作做的够多,相信这种整合性研究就会更具说服力。

侯仰军博士的祖籍在今鲁西南的郛城县,前些年曾跟随王连升教授学习中国古代史,在跟随李学勤先生和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对传说时代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出于对故土的爱,选择了《考古发现与夏商起源研究》这样一个题目。文章虽然写成了,但对于本区域内历史与考古资料的整合研究上仍然存在着



一些问题,好在他对此也有清楚的认识。希望他在这个领域里继续耕耘并有所收获!

方 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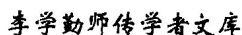
2009年10月8日

(作者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考古发现与尧舜文化研究	(18)
一、鲁西南考古发现与发掘概况	(18)
二、考古学所见四千年前鲁西南地形地貌及自然 环境	(51)
三、考古发现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	(66)
四、虞为夏朝建立前的一个朝代	(90)
第二章 考古发现与夏起源研究	(104)
一、夏王朝不是后人的杜撰	(104)
二、夏族起源考	(108)
三、大洪水的传说	(113)
四、考古学所见大禹治水研究	(117)
五、夏朝的政治中心在古济、濮流域	(130)
六、夏文化与二里头文化	(155)



第三章 考古发现与商起源研究	(160)
一、商族起源之地考辨	(160)
二、商族八迁考	(173)
三、亳都考辨	(179)
四、商文化的东扩与西进	(192)
结语	(199)
主要参考文献	(202)
附录一 菏泽地区各时代遗址统计表	(212)
附录二 山东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第1~6批)	(213)
附录三 菏泽地区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219)
附录四 参考引用论文资料目录	(225)
附录五 微山湖西岸移民述略	(238)
后记	(251)